生物检验等工作。他在传染病和卫生应急管理的风口浪尖上，一待就近 20 个年头。

在上海人的记忆里，2003 年的 SARS 疫情和 2013 年在沪首先确诊的 H7N9 禽流感新病毒，这两件事惊心动魄却又有惊无险。对袁政安来说，这两场战役也是他印象深刻的。

2003 年，SARS 疫情是袁政安履新后遭遇的首个严峻考验。当时，上海发现的全部 8 例患者中，他全程参与，并指挥了所有患者的面对面流行病调查。

“我们采取的是‘准军事化’管理，疫情就是我们的发令枪。”干传染病防治，工作性质就是“白＋黑，7×24 小时全年无休”，袁政安向《新民周刊》记者回忆道，那段时间，他手机 24 小时开机，经常奋战到凌晨两三点，“现在已经养成了习惯，晚上睡觉一定要把手机放在床头”。而这样“随叫随到”的工作性质，导致了他什么电话都得接，“连骚扰电话来了都接”。

上图：上海疾控中心党委副书记袁政安。
摄影 / 沈琳

在非典肆虐全球时，上海没有沦陷，疾控人守护了城市的安全。世界卫生组织更是高度评价了上海的疾控成效，认为上海的信息真实可靠，防护措施科学高效，经验值得推广。

在袁政安的心里，他深知在应对突如其来的重大传染病疫情时，上海的应急能力基础还不是很扎实，各方面的应对也还存在差距。

令他感到欣慰的是，SARS 也带了一些更深远的意义。社会对传染病学科更加重视了——国务院在 SARS 之后颁布施行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》，确立了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处理机制。这也是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制度化进程的开始。之后不久，当时的卫生部成立了应急办公室，负责指导协调全国卫生应急工作。

从 2003 年到 2006 年先后召开的党的十六届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和六中全会上，“预警”和“应急”均成为了历次会议当中的关键词。其间，国务院于 2005 年审议通过《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》，并于 2006 年正式发布实施，明确国家将建立统一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、预警与报告网络体系。

与此同时，传染病防治法、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、突发事件应对法、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先后出台。

到了 2008 年，国务院宣布全国应急体系基本建立。这一应急体系被概括为“一案三制”。“一案”是指应急预案，“三制”包括以政府办公厅（室）应急办为枢纽的综合协调体制，以预防准备、监测预警、信息报告等为内容的应对机制，以及包括一系列法律法规在内的法律制度。此外，网络直报也终结了我国此前长期实行的传染病疫情逐级上报的历史。

在上海，政府相关部门在 SARS 疫情后出台了《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三年行动计划》，至今已实施了 4 轮。上海市疾病综合防治三级网络更加完善，上海市疾控中心也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处，不仅实验室的检验能力达到了一流水准，也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流行病调查队伍。

下图：2015 年 1 月起，黄浦区菜场禁止销售活禽，预防禽流感的发生。